

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症结

——兼论中国的应对

梁 强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拒签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危机愈演愈烈，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则是多重因素影响之下复杂战略博弈的结果。从历史维度看，危机大规模爆发并急剧演进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背景下乌克兰在独立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治理上的双重失败。危机持久无法得到化解的现实症结则在于俄罗斯与美国、欧盟的大国权势斗争。危机对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和实践构成了极大冲击，对重新认识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演进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现代国家治理 大国博弈 中国 欧亚外交

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2013年11月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的准备工作。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事后的很多分析都不断渲染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客观来看，这并非一项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性抉择。首先，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既定国家战略，亚努科维奇任内也一直倡导，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其次，亚努科维奇只是“暂停”签署，而非彻底拒签，因此算不上是一项改变政策的决定，而只是一种战术性安排。最后，亚努科维奇的决定很快就被“矫正”，6个月后乌克兰新政府签署联系国协定。一项政策在短时间内如此反复，充分说明其绝非宏大的国家战略，而更像是一种政治斗争。危机愈演愈烈，引发领土丢失、国家分裂和内战一系列严重后果，有乌克兰

梁 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乌克兰研究室副主任。

自身转型失败的原因，也有俄罗斯、美国、欧盟大国地缘争夺的推动。各方力量的介入使危机成为一场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复杂战略博弈。对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和实践也构成了极大冲击，对重新认识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演进亦有重要启示。

乌克兰：转型背景下的现代民族国家治理

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各加盟共和国成为新独立的国家，均经历了一场国家和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大变动。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的转化；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则意味着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演变。时间已过去了20多年，除了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外，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转型远未结束，有些国家甚至连基本的国家治理问题都仍未获得解决。乌克兰危机如果放在历史的长镜头下，实际上就是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国家治理问题的集中爆发。

苏联解体后，各国毫无例外都陷入到经济灾难中。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滑超过10%，甚至达到30%，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克兰等国的降幅超过了解体时的两倍。根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的报告，2000年独联体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仍不到1991年时的60%，农业生产水平是1991年的68%。经济危机还导致各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2000年各国贫穷人口接近40%，肉类和食品消费较1991年下降超过20%，乌克兰甚至达到50%，真正是节衣缩食。2000年之后，独联体国家在旧的经济废墟上终于引来一轮持久的高速增长。2006年，独联体国家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991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各国年均增长率基本都超过7%，阿塞拜疆甚至达到11%。但这种增长并不均衡。大幅增长的國家主要靠能源价格上涨拉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的GDP仍未达到1991年的水平。2008年的经济危机打断了这轮经济增长，除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仍保持较高增长率外，其他国家都陷入低速增长。到2010年，独联体国家整体国内生产总值比1991年只增长了15%，年均增长率不到1%。¹ 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上，绝大多数国家仍未恢复到苏联水平。解体对各国经济的深度冲击，可能要好几个20年才能消化。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通过对人民参政议政，言论集会自由，合法反对派，自由公正选举，司法立法独立，帮派政治等指标的综合评价，认为从苏联解体中诞生的15国中，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只有乌克兰、摩尔多瓦可视

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 лет Содружеству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1991-2010//Статкомитет СНГ, <http://www.cisstat.com/20cis/>, 2015年4月11日登录。

为自由民主国家。但后两国在经济上的表现足以用“失败”来形容：2011年15国的人均GDP水平较1991年增长率排名的后五位分别是：格鲁吉亚（160.24%），吉尔吉斯斯坦（136.29%），乌克兰（132.49%），摩尔多瓦（111.38%），塔吉克斯坦（107.26%）。各国月平均工资水平的后五位排名是：乌克兰（356美元），阿塞拜疆（317美元），亚美尼亚（293美元），吉尔吉斯斯坦（137美元），塔吉克斯坦（63美元）。从这两组数据可看出，乌克兰政治转型较为成功，但在经济社会转型上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失败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在国际认同方面，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式顺理成章地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外，其他各国自我身份的认同建构远未完成。部分国家仍然没有被世界经济体系完全接纳，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就是明证。¹ 各国独立后广泛参与和建立各种一体化机制，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尝试寻找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归属感，但成效甚微，而且这些机制反倒成为域外势力争夺新独立国家的平台。依附在人口、文化上的旧情感记忆也始终困扰着各国国内的身份认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除俄罗斯、白俄罗斯两国外，各国都在推行“去俄语化”，但俄语仍被视为“主流语言”，在城市和商界得到广泛使用，完全使用母语的人只有在农村和年轻打工者群体中才可见到。新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还促进了各国在领土资源矛盾上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些矛盾在苏联时期被强力的中央政权压制，苏联解体后大范围爆发。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冲突，塔吉克斯坦内战、里海国家的大陆架划分争端、中亚国家的水资源和电力矛盾等。在乌克兰，这些问题最终以“东西分裂”的形式体现出来。

地理和政治上的双重东西分裂一直是外界看待和解释乌克兰危机的最有效方式。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乌克兰的分裂事关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族裔关系层面，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由于历史原因，前苏联范围内其他国家中遗留的俄罗斯族人口将近2000万，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以个体的形式回归俄罗斯，因而强烈希望所在国能保障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益。如果这一诉求得不到实现，这些俄罗斯族人口很自然就会有独立或者整体回归俄罗斯的倾向。第二个层面是乌俄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一点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问题上体现得很明显。克里米亚历史上长期属于沙俄，后者在此与多个欧洲大国流血战斗。1954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纸命令将克里米亚划给当时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造成了今天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在1991年、1994年两次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并要求加入俄罗斯。出于对俄乌关系大局的考虑，莫斯科予以婉拒，但该问题从此成为俄罗斯

¹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六国仍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挟制乌克兰的一张王牌。第三个层面才是地理上的东西分裂或者政治上的橙蓝对立。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差异本来就很大，再加上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西部是农业大区，独立后与欧盟往来较多，而东部是工业大区，当地的经济利益诉求不同，政治立场自然会有歧异甚至对立。但这种矛盾只是乌克兰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口之间的矛盾，亦即同一身份认同者间的政见之别，顶多是民族认同问题，而非国家认同问题，更不是不同民族的对立。与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国存在的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分裂有本质区别。所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其主体居民都是乌克兰公民，其“独立”诉求是为获取更多权力和资源的政治举措，没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基础。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都与俄罗斯密切联系，所以乌克兰的东西分裂本质上是乌俄关系问题。这种情况在俄罗斯与其他新独立国家，特别是与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同样存在。任何一个层面处理不当，都很容易演变为双边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再出现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或者在对外关系中与俄罗斯严重交恶，那就会面临和乌克兰一样的困境。

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都与俄罗斯密切联系，所以乌克兰的东西分裂本质上是乌俄关系问题。

俄美欧的大国权势斗争

乌克兰一直排斥与俄罗斯的一体化，2005年从“俄白哈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退出，此后俄罗斯着手建立俄白哈关税同盟。2013年5月，也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上半年，乌克兰主动与俄白哈关税同盟签署合作备忘录，以事实上的观察员身份加入。做出这样重大让步的目的，就是换取乌克兰向欧盟靠拢一小步，签署联系国协定。这是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俄欧之间施展平衡术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的外交战术，但他严重低估了普京的反应。2013年8月乌克兰《镜报周刊》公布了一份据说是“消息灵通者泄露给编辑部”的文件。文件中阐明了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对俄罗斯的危害，明确提出俄近期的目标就是集中和全面的对乌施加影响力以阻止其签署协定，并详细描述了俄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选择，迫使其远离欧盟而回归欧亚同盟的举措。文件中还写道，现在乌国内到处弥漫的反对亚努科维奇的声音，很可能会转化成仇俄情绪或促进其增长，这会蒙蔽乌克兰选民的双眸，使其无法客观思考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帮助反俄力量夺取政权。在现在的复杂状况下，“橙色革命”在乌克兰重演的可能性极大。亚努科维奇一旦丢掉政权，将立即引发地区党的分崩离析，这将置俄罗斯于“焦土之上”，俄在乌克兰将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可以依靠或指望。俄罗斯要借鉴历史上赫梅利尼茨基（З. М. Хмельницкий）领导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经验，迅速培育构建俄国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网络，抵抗反俄力量和情绪的增长，确保俄罗斯中意的候选人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力争使乌克兰在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同

盟。¹ 这份文件当时并未引起关注，俄方也未对此做出任何评论。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文件中的许多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再回过头来看，无论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其中的洞察力和预见性确实发人深省。

文件中认为，如果乌克兰批准与欧盟的自贸区协定，就将不可能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2015年1月正式升级为欧亚经济同盟），从而威胁到独联体自贸区的建设。乌克兰的机械制造业、农业、冶金业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市场，这些产业构成了乌克兰经济的基础，是乌克兰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加入欧亚一体化将使这些产业的复活和发展获得保证，让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5%—18%，对外贸易可望顺差90亿美元。加入与欧盟自贸区将极大地破坏乌克兰的经济环境，每年对外贸易逆差至少15亿美元，乌经济也将遭遇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政府面临破产，大部分居民陷入失业或赤贫，领导人失去政权。文件还认为，乌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现代化的升级改造，而是缺乏足够的投资，以至无法保证正常的生产。与欧盟的财政援助和信贷带有各种政治义务不同，俄罗斯能够迅速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为其打开关税同盟的市场，帮助其维持预算平衡。²

这些都是站在俄罗斯角度的分析。理论上来说，联系国协定的签署只是签署国对外经济一体化上的一种选择，并不意味着其经济合作的战略性转向，更不会自动成为欧盟成员。一个国家同时加入多个自贸区协定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并不鲜见。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国际部主编卢卡斯（Edward Lucas）认为，即便2004年上台的尤先科政权一直执政，乌克兰也要15—20年才能完成加入欧盟的政治经济准备工作。³ 所以加入欧盟自贸区就会威胁乃至破坏俄国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说法并不成立。俄罗斯之所以对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的立场极其强硬，主要在于以下原因。

首先，欧盟虽然是个以经济一体化为主的国际组织，但以往绝大多数加入欧盟的前苏联范围内的国家同时也选择了加入北约，因此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这一举措的政治与战略含义不言自喻。俄罗斯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乌克兰在经济上的去俄化，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脱俄化、反俄化，就像其他加入欧盟同时加入北约的国家那样，不仅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挤压到极限，承担起从未有过的巨大安全风险，而且给俄罗斯增添了诸多新的政治经济难题。这是俄罗斯绝不能再

1 О комплексе мер по вовлечению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415//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29,16 августа 2013, <http://gazeta.zn.ua/internal/o-komplekse-mer-po-vovlecheniyu-ukrainy-v-evraziyskiy-integracionnyy-process-.html>, 2015年4月11日登录。赫梅利尼茨基是反抗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领袖。1651年波兰占领基辅重新统治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请求俄国出兵联合抗击波兰。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同俄国代表在佩列亚斯拉夫签订了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

2 там же.

3 Евроинтеграция Украины - путь к краху Путина//Экономика, 17 декабря 2013, <http://www.economica.com.ua/top/index.php4/article/22823199.html>, 2015年4月11日登录。

接受的。其次，俄罗斯坚决抵制乌克兰加入欧盟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乌克兰是在苏联时期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乌克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统一，并且在苏联的鼎力举荐下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莫斯科向乌克兰投入的巨大金融和经济资源更是难以计数，基辅现在绝大部分公共建筑都是战后苏联出资修建的。基辅还是俄罗斯文化的发源地，在俄罗斯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神圣性。所以无论谁主政克里姆林宫，都不会接受倾注了巨大心血和感情的斯拉夫兄弟转投他人怀抱。欧盟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也与普京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后者绝不会允许同种同源的乌克兰被“异族”染指，成为西方文明的“试验田”。最后，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其上台之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普京在21世纪初曾默许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一个重要原因是维护“9·11”事件后建立起来的俄美反恐同盟，进而在能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但现实使普京很快就意识到：西方并非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单边主义而非与西方的合作自此成为其实现外交抱负的主要手段。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利用这次大张旗鼓的斗争实现18世纪叶卡特琳娜大帝时代获得的对全部乌克兰领土的永久控制。不过，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影响力，而非实际的政治控制。最高方案是以和平方式根本性地改变乌克兰国体，使其成为一个联邦制下的中立国家，在实现内部和解的同时也使其回归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轨道。最低方案是乌克兰东西方分裂，或者陷入持久内战，这是俄乌双方和国际社会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势必军事介入，当然莫斯科也将为此付出长期的政治安全风险的巨大代价。不到万不得已这绝非一个好的选择。居中方案也是现在莫斯科实际奉行的，就是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分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独立州”获得高度的法定自治权，成为随时可以加入他国的特殊政治实体，也可以成为像阿布哈兹那样的半独立国家。这样莫斯科将处于平衡操纵者的有利地位，在外交上也能更加主动。通过这样的事实分裂，俄罗斯实现了在乌境内制造长期的不稳定和去中央集权化的目标，有效地防止乌克兰倒向西方（在现有机制下，欧盟和北约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乌克兰）。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斗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也输掉了与欧美争夺乌克兰民心的斗争。2014年5月乌克兰的民调中，52.5%的人认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是欧盟，认为是俄国的跌至创纪录新低16.6%。而在2011年2月的民调中，这组数字还分别是40.4%和35.7%。¹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利用这次大张旗鼓的斗争实现18世纪叶卡特琳娜大帝时代获得的对全部乌克兰领土的永久控制。

¹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нтересы внешних игроков// БелаПАН,30.10,2014,http://naviny.by/rubrics/abroad/2014/10/30/ic_articles_118_187426/, 2015年4月11日登录。

欧盟目前显然不准备明确给予乌克兰加入的前景，而且也不匆忙向乌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主要利益在于，尽快化解危机恢复与俄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能源运输安全。为此，欧盟不惜在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谈判中允许俄罗斯介入，将欧盟与乌克兰自贸区的实施延迟一年（届时还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继续延期），事实上干涉并危害到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危机使得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也陷入深刻的危机中。欧盟的拖延政策和自身的不确定性对乌克兰社会民意有很大影响。2014年3月的民调中，乌克兰将近42%的人更希望“加入欧盟”，支持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的降到33%。10月的最新民调中，52.8%的人支持加入欧盟，48.6%的人支持加入北约，支持加入关税同盟的则下降到18.9%。¹但支持加入欧盟的始终未达到2/3的绝对多数，这说明乌克兰国内在经济一体化的方向上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未来同样会摇摆不定。

美国与乌克兰在建交之初建立的“民主伙伴关系”只是幌子，其对乌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乌克兰的无核化。乌克兰销毁境内全部核武器、批准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被当作发展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先决条件。核武器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提不上议事日程，乌美关系一度因此陷入僵局，美国政界甚至有人提出把乌克兰列入伊朗、伊拉克等危险国家行列中。在此目标实现后，才是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实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遏制。与无核化这样明确且必须达成的硬性目标相比，后者是一种战略模糊的弹性目标，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在操作上也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东西方平衡外交下的独立，可以是融入西方的独立，也没准儿是倒向俄罗斯的独立。当然，最后一种独立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至于主权领土完整看似明确，但实践中往往成为大国交易的标的物。比如克里米亚，俄罗斯将来肯定会利用国际社会对既成事实的认可，与美国在各个领域做交易。乌克兰东部分裂是考验美国对乌政策的一道关键红线，但同样存在事实分裂和法律分裂的界限。最重要的是，美国绝不会向乌克兰、格鲁吉亚这些对其并不具有核心利益的地区投入实质性的援助，换句话说，不会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派出军队。俄美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对抗虽然激烈，但并未超出在俄格战争后的对抗烈度。美国对格鲁吉亚的援助、对俄罗斯的制裁谴责、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调动，与当前在乌克兰及其周边的举措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程度上也没有太大差别。美国既然不会在格鲁吉亚对俄使出全力，很难相信它会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一争高下。未来以同样的方式化解危机走出对抗并非没有可能。²危机

1 Соцопрос: 48,6% украинцев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АТО, 52,8% – в ЕС // ГОРДОН, 12/10/ 2014, <http://gordonua.com/news/society/Socopros-486-ukraincev-podderzhivayut-vstuplenie-Ukrainy-v-NATO-528-v-ES-44325.html>, 2015年4月11日登录。

2 详见梁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目标——基于美乌关系的分析（1992—2004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5年第2期。

已一年有余，美国只是提供最低限度的财政援助，承诺提供的数亿美元军事援助绝大部分没有兑现。即便这些军援落实，甚至华盛顿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也未必能帮助基辅提高军队战斗力和改变动荡的政治局势。美国提供武器的目标是将俄罗斯引入到一场低烈度的持续战争中去，使其无暇关注在世界其他地区与美国的竞争，但同时又不能让冲突扩大化，以免造成整个地区的动荡。与危机初始时积极推动达成日内瓦协议不同，乌克兰内战扩大后美国自始至终未参与俄欧乌三方达成的任何协议。美国现在基本上视乌克兰危机为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事，认为欧盟应该承担化解冲突、解决麻烦的主要责任。美国自己在乌克兰的政策目标排序如下：首先是反俄，其次是控制政局，最后才是恢复经济、推动乌克兰向欧盟和北约靠拢。

对中国欧亚外交的冲击

乌俄两国都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贯的中立立场，保持了自己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基本原则。与之前消极的置身事外的“保持超脱”不同，中国这次的中立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姿态。无论是外交部发言人“历史经纬”、“事出有因”的语义抽象但内涵丰富的表述，还是中国领导人在危机之后的几次专门表态，都表明了中国愿意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立场”化解危机。事后来看，中方的上述立场是得当的，符合危机的实际情况和演进，也得到了乌俄两国的共同认可。但姿态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危机对中国欧亚外交更深层面的冲击。

（一）对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冲击

2011年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后，乌克兰成为中国投资增长最迅猛的国家之一，中国也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除石油之外的第一大普通商品贸易国。当乌克兰的政客们还在为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内斗时，商人们已经看到了通往东方的第三条出路。以中国援建的“煤改气”项目为例，该项目每年可加工600万吨煤，约合50亿—60亿立方米天然气，价值70亿—90亿美元。这使乌克兰每年能少进口8%—10%的天然气，对乌克兰这样严重依赖天然气进口的国家，其益处不言而喻。由于中乌间的经贸协定多数都是政府间协定，是以与现政权的稳定关系为前提的，所以中国最希望乌克兰政局稳定。危机初始，中国领导人不仅按预定计划和规格接待了乌克兰代表团，而且高度评价了亚努科维奇本人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两国领导人批准的《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年）》也表明了中国对延续亚努科维奇任内建立的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信心。中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出发点是促进乌克兰的独立和发展，而不是控制和影响乌克兰，所以中国的所有信贷都没有附加政治条件，基辅不必为此背负任何重大的政

治义务。但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乌克兰政局发生逆转后，如何确保中乌政府合作项目的政治担保和可持续性，亚努科维奇时期的协议项目能否继续，如何继续？乌克兰新政权是否会重新考虑乌中经济合作的优先性？考虑到政权变更总是会带来一系列人事和规则变动，即便新政权会保持亚努科维奇时期的对华合作路线，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也会对国家层面得到的经济利益进行二次分配。这显然不会是纯粹的经济考量。中国企业和职能部门全力防止乌克兰内乱对中乌经济合作成果消解的同时，也要做好重起炉灶的准备。

危机发生后乌克兰合法政权迟迟未能产生，中国虽然有很多诉求，囿于形势也只能止步不前。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和乌克兰新议会选举产生后，中国与乌克兰政府的交往名正言顺，中乌关系的平稳过渡和持久稳定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如果就是回到亚努科维奇时期前的普通国家关系，维持现在的低级别联系已经足够，但这显然与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不符。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就必须采取主动，特别是要尽快与新政权建立更高级别的联系。目前俄、美、欧、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领导人都已经实现了与波罗申科的会晤。当然，鉴于新政府仍笼罩在之前临时政权的阴影下，必须先对其中的政治生态做出清楚的了解，之后再实施恰当的政治交往。否则再多的协议和声明，到头来也只是一纸空文。

乌克兰政权变更后 中乌经济合作最大的 难点是克里米亚。

乌克兰政权变更后乌中经济合作最大的难点是克里米亚。亚努科维奇访华期间主动提出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是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后首次获得中亚之外的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中乌签署的诸多经济合作备忘录其中之一就是中方向克里米亚投资。乌方希望在这里建设现代化的机场、液化天然气码头和船坞，对顿兹斯拉夫湖畔的深水港及配套工业交通设施改扩建，将年吞吐量增加到1.4亿吨，成为中国机械产品输送东欧和向中国运送乌克兰农产品的中转港。¹ 通过黑海向欧洲和地中海输送物资非常便捷，成本很低，如果得到落实将是“煤改气”后中乌关系又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战略合作项目。克里米亚有机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开辟中国向欧洲出口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反过来对欧洲也是如此，有望成为中欧共同经营欧亚大陆的新渠道。危机后这一切都成了未知数。乌克兰官方已明确表示有关港口项目的谈判不会举行，俄方也透露不会与中方考虑合作建设克里米亚深水港。俄罗斯希望中国参与的项目是建设从刻赤海峡到克里米亚的跨海大桥，这将被视为是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支持俄方的重要举措，之后中国企业还会获得克里米亚的其他开发项目。²

1 Украина и Китай совместно построят в Крыму глубоководный порт//Ukrinform, 05.12.2013, http://www.ukrinform.ua/rus/news/ukraina_i_kitay_sovместно_postroyat_v_krimu_glubokovodniy_port_1583346, 2015年4月11日登录。

2 Китайцы войдут в Крым по мосту//Коммерсантъ, 05.05.2014, <http://www.kommersant.ru/doc/2464879>, 2015年4月11日登录。

对中国来说，克里米亚无论归属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经济效用都是一样的。但在乌俄存有主权争议、美欧对克里米亚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对克里米亚任何经济项目的参与对中国来说都具有很大风险。除非得到双方的默许，否则中国很难在这里采取经济主动。这不只是主权之争，而且涉及克里米亚与欧洲的经济联接问题。如果这一点无法保证，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蓝图就无法实现，也没有投资的必要，酝酿已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计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

（二）对中国欧亚战略的冲击

中国对欧亚地区的外交缺乏宏观战略设计，乌克兰危机后战略与政策的脱节尤其明显。2011年底中国有关部门曾对欧亚外交有过一个轴心（即俄罗斯）、两个支点（即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政策构想。¹ 但事实表明，乌克兰无法发挥其作为战略支点的基本功能。乌克兰派高级外交官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后，中国内部有声音批评乌克兰“支不起来”，现在看来在其他更重要领域也同样如此。再加上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多个欧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样支点太多反而等于没有支点。笔者认为，可能的解决方式是主动“提升”中亚在中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至少在地区层面上达到与俄罗斯并列。作为中国外交未来牵涉利益最大，风险最高，直接攸关西部战略安全的周边外交重点地区，中亚不仅应当“深耕”，而且要整固。“中亚+俄罗斯”作为中国欧亚外交的两大轴心，可以彻底化解中俄在中亚的矛盾。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矛盾和俄欧在乌克兰的矛盾性质是一样的，即地缘夹缝地带在两大相邻力量间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划分两大力量在此的势力范围问题。受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一矛盾短期内无法改变。中亚联合起来作为独立的国际角色发挥作用，有助于避免中俄之间出现俄欧争夺乌克兰那样的悲剧。“中亚+俄罗斯”的双轴心不仅能够支撑起中国的“西进”战略，同时也是对“东固”战略的双轴心“东盟+美国”的呼应。这样在东西两个方向上中国都有一个大国和一个地区性的联合体作为自己的外交对象，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借鉴，相互助推。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不久，又提出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且迅速将两者整合为“一带一路”的新对外经贸大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西进”加上“东固”四轴心战略的经济体现。四轴心战略将为中国酝酿已久的周边大外交提供一个基本构架和基础，打破那种

1 该政策设计的首次公开表述参见尹树广：《胡总哈俄乌之行凸显中国“欧亚新战略”》，香港《文汇报》，2011年6月22日。亦可参见 Лян Цян. Кита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евроазиат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итая //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ежду Украин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атери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рт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29 мая 2013 г. Кие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 при МИД Украины, 2013. С. 45-48.

所谓“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多边是舞台”的过于学理化的外交设计，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官们更好地去施展手脚。¹

（三）对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表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值得坚守的底线，但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做法，如侧重发展与各国执政集团的交往（避免甚至忌讳与反对派的接触），基于经济互利的考量开展对外经济合作（而非综合考虑投资的政治风险），重形式大于重实质的战略伙伴关系等，都受到了丰富变化的外交实践本身的冲击。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干涉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关乎道义考量的政治问题，而是与成本收益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干涉本身无可厚非，但成功的干涉必须而且应该是负责任的干涉。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干涉，留下一个烂摊子一走了之，显然不负责任，也是不成功干涉的典型。这样的干涉还不如不干涉。如果说不负责任的干涉可以归咎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短视和技术性缺陷，乌克兰危机后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对国际事务的更独立的判断和对中国外交愈加深刻的参与，则深刻地反映出近些年中国外交内部环境的变化。

危机之初中国部分媒体过早的表现出了亲俄倾向。随着危机的发展，中国舆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甚至多种声音，包括对中国在联合国投票中弃权的反对。² 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俄罗斯从自己的逻辑出发认为，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官方允许下才会出现，说明中方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简单的三条：维护中国在乌克兰的重大经济利益；确保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平稳过渡；不因为任何不当表态危及本国的稳定和国家统一。

观点仍然模糊不清；否则，舆论中就只会出现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这种担心也许符合实际。但更重要的是，俄方应该明白中国外交的任何举措都必然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选择。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简单的三条：维护中国在乌克兰的重大经济利益；确保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平稳过渡；不因为任何不当表态危及本国的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外交另一项基本原则是不结盟。迄今为止中国与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是结盟关系，而且是灵活多样，多层面、有选择的协作关系。换句话说，在符合中国利益的

1 对此的详述可参见梁强：《中国的欧亚大战略》，《南风窗》，2013年第4期；梁强：《中亚：中国周边外交新轴心》，《南风窗》，2013年第10期。

2 中国著名中亚问题专家杨恕指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地区，以公投的形式决定其法律地位的做法，我们都要坚决反对，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主义”。“对于克里米亚公投，中国不应该在联合国弃权，应公开表达我们的反对态度，我们不能说‘尊重人民选择’，只能讲‘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参见杨恕：《合并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利弊难料》，光明网，2014年3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14-03/21/content_10740516.htm，2015年4月11日登录。

议题上当然要坚决支持，在其他议题甚至有悖中国利益的议题上，中国也无需为任何人背书。中国学者和中国的媒体，需要向公众阐明俄罗斯外交举措对俄方的利益逻辑，但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利益逻辑辩护。这更多是俄国学者要做的，而且无论普京做什么，他们都会对之做出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解释。中国学者和中国媒体要做的，就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从公正、客观、全局、历史的角度对其利益逻辑做出评价。在一个充分自由表达的世界，只有基于事实的解释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引导中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未来的中国外交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而且要面对更加多元化的内部环境的生长带来的压力，这需要对外交的核心原则有更加透彻的了解和更加广泛的共识，使之真正成为符合国内民意、持之以恒、广泛适用的中国原则。

余 论

乌克兰危机相关各方在克里米亚、东部分离势力问题上立场截然对立或有较大分歧，但在乌克兰统一、建立有实际掌控能力并得到全国普遍认可的中央政权、奉行东西方平衡外交、尽快复兴乌克兰经济等更具宏观性的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特别是俄罗斯已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危机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已经排除。危机的前景并不难预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相信是可以借助于非军事的方式通过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和交易得到化解的。苏联解体后的历史遗留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根本解决，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斗争也还会持续，但乌克兰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有望逐步恢复稳定。具体的化解步骤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两个明斯克协议基础上的真正实现停火，冻结冲突。其次是重建俄乌关系，俄欧、俄美停止对抗。最后则是事关乌克兰长久发展的两大根源性问题——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和大国对乌克兰这样夹缝地带国家的持久争夺得到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一个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乌克兰未来的前景都很难说是光明的。

2004年11—12月的“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在政治上失去了规范，在经济上失去了发展，在外交上失去了平衡，在人民中间失去了信任。¹ 其直接后果有三：一是频繁破坏游戏规则，长时间陷入政治内耗。二是民众对现行政治运行普遍不满，政府失去权威，非党派的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三是理性被极端裹挟，右翼极端势力在乌克兰政权最初变更中起了关键作用就是最好例子。乌克兰“失去的十年”（2004—2014）给世人的教训就是，一定要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人类

1 详见梁强：《乌克兰：失去的十年（2004—2014年）》，《东方早报》，2014年3月4日。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经转型，其核心是自由地选择一条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并不必然通向繁荣稳定。相反，中亚集权体制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表明，自由民主与繁荣稳定之间不但没有逻辑关系，而且可以背离发展。“颜色革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治国理政逻辑在独联体地域内一次失败的实验。但俄国模式就一定适合这些转型国家吗？自由派在乌克兰的再次夺权同样给出了明确的否定。亚努科维奇执政的四年里，俄国不但未对乌克兰走出经济困境起到支持和引领，反而因为种种干涉被认为是乌克兰走上正确道路的障碍，在整个后苏联地域内也是如此。西方有评论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越是倾向于西方发展道路的国家，政治经济就越加动荡，以至领土丢失国家分裂，越趋向于失败国家。乌克兰危机说明，无论任何模式，在做出选择之前都必须有独立选择的能力和决心。作为一个生活在国际政治丛林法则中的国家，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它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非民主自由，而是自己的独立。革命充满着激情，但不能在革命的梦想中，迷失了自己的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欧洲五大国体系变成了英法两国主宰而俄德两个战败国被排除在外的不完整、不稳定体系。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彻底解体，形成了巨大权力真空，成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试验场。与此同时中东欧出现第一次大的民族独立浪潮，新独立国家间的民族、宗教、领土矛盾成为欧洲新的动荡之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欧民族国家的数目和构成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各国领土边界再次遭遇大范围的重新划分。冷战结束后，随着苏东阵营崩塌和苏联解体，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域内出现新的权力真空，也迎来新一波的民族独立浪潮。一战后欧洲国家的边界划分不到20年就被破坏殆尽。二战后雅尔塔一波茨坦体制确立的边界安排和民族国家构成虽然相对稳固，但同样要等到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才获得普遍国际承认。冷战后欧洲的边界安排同样命运不济：它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种小规模侵蚀、破坏，从1993年元旦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和平分手，到南斯拉夫联盟的血腥解体，再到2008年的俄格战争和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终于以最极端的方式被颠覆。历史就是这样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地重演。20年，似乎成了20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无法绕过的规律性数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最大程度的基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公正确立新的民族国家构成和边界安排，同时由相关大国缔结一揽子的条约作为国际保证。

乌克兰危机集中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的碰撞。后者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理论基础，描绘了地区一体化，进而全球化的美好愿景。其核心是国家间合作的经济红利要远远大于武力掠夺的红利，后者付出的代价则远远大于破坏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损失。贸易战，货币战，舆论信息战，“颜色革命”成为新的国家权势斗争形态。现实主义的基础是

国家的权力角逐，认为国家基于天生的权力属性，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不管蛋糕做的有多大，各国总是想占据最大份额的那块。因此各种硬权力的斗争直至战争这样的终极形式是无法避免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为避免这样的不归路提出了很多方法，从“均势”这样的动态平衡，到划分势力范围，直至集团对峙的铁幕僵局。其核心实施者是各国高瞻远瞩又极为务实的政治家，以及高超的外交实务家。冷战后中东欧的转型在欧盟全面介入下进行，即便如此也仍然出现了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和科索沃种族灭绝这样的灾难。后苏联时期的国家转型要舒畅平稳进行，恐怕必须彻底依靠本地区大国的全面主导，域外国家不恰当和过分的介入只会适得其反。

后苏联时期的国家转型要舒畅平稳进行，恐怕必须彻底依靠本地区大国的全面主导，域外国家不恰当和过分的介入只会适得其反。